

# 论外国移民社会问题对欧洲 非传统国家安全的消极影响<sup>\*</sup>

## ——基于社会学视角的考察

宋全成

[山东大学, 济南 250100]

关键词: 外国移民; 社会反抗; 种族主义; 非传统国家安全; 社会融合

摘要: 20世纪下半叶的欧洲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经历了从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到非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的重大转折。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后,由大量外国移民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对欧洲国家的非传统国家安全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具体表现在:外国移民的社会犯罪,威胁着欧洲国家的民族安全;外国移民的社会反抗,威胁着欧洲国家的国家安全;由移民问题所诱发的排外主义、种族主义思潮与劣行,威胁着欧洲国家的社会安全。因此,为了维护欧洲国家的非传统国家安全,欧洲国家不同种族、不同族群的社会融合就成为了亟待解决的严峻社会问题,但外国移民社会融合的任务依然是任重而道远。

中图分类号: C9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511(2009)02-0052-09

宗教冲突与民族冲突是导致20世纪下半叶世界局部的、有限性重大事件的主要诱发因素,同时也是影响世界各国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重要原因。这一问题在欧洲,特别是在西欧表现得尤为明显。从历史发生学的视角来看,20世纪下半叶,西欧各国经历了从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到非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的重大转折。在冷战时期,东西方的军事冲突成为欧洲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优先考虑的传统国家安全问题。与此同时,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外国移民,特别是穆斯林移民的大量增加,西欧各国也面临着欧洲区域内

的、或者欧洲一国内的本土民族与外来民族(主要是穆斯林民族)、本土宗教(基督教)与外来移民宗教(伊斯兰教)相互冲突的非传统意义的国家安全问题的威胁。但与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相比,由于外国移民的存在所导致的欧洲国家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也只具有边缘性的意义。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冷战的结束,传统的国家安全威胁已经消逝。但来自东欧、东南欧和非洲、亚洲地区的移民和难民的日益增多所导致的、有可能引起宗教文化冲突与民族冲突的移民社会问题(主要表现为外国移民的社会犯罪、社会反抗,以

收稿日期: 2008-04-05

作者简介: 宋全成,男,法学博士,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欧洲移民问题与欧洲一体化”(项目编号:03JD810003)、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法国移民社会问题”(项目编号:07BSHZ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及与此相关的种族主义的思潮和排外主义的暴行),却对欧洲国家的非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威胁,从而成为了欧洲国家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因此,本文拟就与外国移民相关的社会问题对欧洲非传统意义国家安全的威胁这一问题,从社会学的视角作一初步探讨。

## 一、外国移民的社会犯罪,威胁着欧洲国家的民族安全

20世纪50年代以来,欧洲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经历了从传统的外迁移民国家到移民输入国家,以及从传统的民族国家到非传统意义上的现代移民国家的根本性转折。与此相联系,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移民或外来少数民族,正在成为欧洲国家常驻人口和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欧洲,特别是在西欧国家的法国和德国,从民族与宗教两个视角来看,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移民,已成为最大的外来少数民族。而穆斯林移民的社会现实,正严重地威胁着欧洲国家的民族问题。

由于缺乏持续的、有效的、一体化的社会融合政策,与美国、加拿大的外国移民相比,欧洲国家的外国移民并没有较好地融入到欧洲国家的主流社会当中。特别是那些有着深刻的伊斯兰教宗教文化背景的来自土耳其、中东地区、北非和马格里布地区的穆斯林外国移民,由于他们所信奉的伊斯兰教宗教文化不重视现代教育以及穆斯林外国移民文化水平的普遍低下,这些外国移民在西欧国家找到工作的机会,与那些欧洲国家的本土民众相比,更加低少。他们中的很多人尽管生活在社会保障制度至臻完善的西欧国家,但基本上还是依靠救济金维持生计。而那些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的、无所事事的年轻穆斯林移民,对生活的绝望以及欧洲主流社会所倡导的个性主义的张扬,使他们更容易走上吸毒、抢劫、走私、盗窃等社会犯罪的道路,从而不仅对欧洲国家主流的本土民族的安全

构成了挑战,而且也直接威胁着欧洲国家的民族安全。

在法国,尽管历届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让外国移民融入法国社会的措施,但由于左翼政府与右翼政府的定期更迭,以及与此相关的外国移民政策的左右摇摆,因此,法国政府始终缺乏有效的、持续的、一体化的社会融合政策。所以,来自北非的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移民及其后裔,最终还是难以实现与法国主流社会的真正融合。毫无疑问,这与外国移民受教育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和伊斯兰教文化对教育所持的消极态度有着密切的关联。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非穆斯林移民与穆斯林移民的教育文化水平的比较中,得到进一步的求证。20世纪70年代,在法国的外国移民中,葡萄牙移民的文盲率是29%,而阿尔及利亚人和摩洛哥人的文盲率则分别达到了74%和79%。20世纪80年代后迁移而来的马格里布地区和其他非洲国家的穆斯林移民,则多为目不识丁的农民。从社会结构和形态跨越的角度来看,他们几乎都是从本国落后的农业社会,一下子就置身于法国发达的工业社会,甚至是后工业社会,所以面对着现代社会的文明,他们充满了彷徨而无所适从。从文化类别转换的角度来看,他们是从单一的、封闭的、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教文化一下子转换到了多元的、世俗的、开放的、灿烂的法兰西文化。由于他们的文化程度较低,再加上所处社会和文化的巨大差异,如果穆斯林移民不积极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如果法国政府没有有效的、连续的、一体化的社会融合政策,这些穆斯林移民要想适应法国主流社会的生活和文化,自然地融入到法国的主流社会中,就只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另外,受伊斯兰教文化的熏陶和法国鼓励生育的政策驱动,穆斯林的移民家庭要比一般的法国人家庭生育更多的孩子。而伊斯兰教文化中男尊女卑的传统,使穆斯林移民家庭中的女孩无法受到良好的教育,她们往往中学尚未毕业便辍学在

家,帮助父母照顾弟弟、妹妹,男孩们则受到宠爱和放纵。而法国宽松的、开放的、自由的学校管理,无法对他们进行积极、有效的约束和教育。另外,由于穆斯林外国移民经济收入低,有些人甚至只是依靠社会救济金生活,因此,他们大多居住在贫民窟或困难居住区中,而那里的社会管理往往十分薄弱甚至失控,再加上穆斯林移民及其后裔在社会教育、就业、语言、生活习惯等方面倍受法国人的歧视,因此,他们中的不少青年人感到前途渺茫而无所事事。于是,这些青年人便走上街头闹事、抢劫,焚烧汽车或是干起入室盗窃等勾当,与西欧国家的本土青年人相比,他们更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正因为如此,法国的犯罪率才持续上升。从1972年到1983年,法国的犯罪率增加了112.7%,其中盗窃案件的数量增加了281%,吸毒人数增加了756%。据法国有关部门统计,在法国由于生活贫困、缺乏教育和普遍的高失业率,穆斯林移民后裔中存在着更为严重的青少年犯罪和吸毒现象。1994年,在法国犯罪的青少年中,有55%属于北非裔,在吸毒的青少年中他们也占了43%。<sup>[1](P37-38)</sup>

与法国不同的是,在1997年德国国籍法改革之前,在德国的穆斯林移民,主要是土耳其的穆斯林移民是不可能像法国的移民那样,通过加入国籍而从外国人的队伍中消失的。尽管来自土耳其的穆斯林移民在德国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已经有了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子女,但因为德国实行拒斥移民的政策,在加入国籍的问题上,主要实行血统法,因此,这些移民加入德国国籍的可能性几乎是微乎其微。在这种背景下,德国青年穆斯林移民,也与法国的青年穆斯林移民一样,滋事生非,扰乱治安、打架斗殴、偷盗抢劫的事件时有发生。由于文化、宗教信仰以及生活习俗的不同,以及德国实施的拒斥移民的政策,这些外籍穆斯林移民难以融入德国的主流社会,这样,他们同德国本地人产生矛盾和冲突,从而引起德国本地人的不满,也

就不难理解了。而德国大众传播媒体对外国移民的社会犯罪问题所进行的广泛报道,更使德国人对外国移民,特别是穆斯林移民社会犯罪的增多,充满了恐惧和不安感。德国的普通国民认为,外国穆斯林移民的社会犯罪损害了他们的切身利益,正在威胁着德国的民族安全。在德国2000年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中,有1/2的被调查者认为,德国的外国穆斯林移民太多了,影响了民众的社会安全感和德国的民族安全。

除了法德两国,即使在被看作是外国人移民政策最为成功的瑞典,在2000年夏天所进行的一场公民心态民意测验中,也有2/3的被调查者对外国移民的社会犯罪率上升持有恐惧感,认为他们威胁着瑞典的民族安全。<sup>[2]</sup>“9·11”事件以后,欧洲国家的穆斯林移民中的恐怖分子活动,更加剧了欧洲国家的民众对穆斯林移民社会犯罪的不安,他们普遍认为,越来越多的穆斯林移民,正在威胁着欧洲国家的民族安全。

## 二、外国移民的社会反抗,威胁着欧洲国家的国家安全

由于外国穆斯林移民在教育、就业等许多领域处于不平等的社会地位,而且还不断遭受到种族主义所导致的社会歧视,因此,他们中的不少人存在着对所居住的欧洲国家的主流社会进行反抗的心理。只要有合适的机会,他们这种反抗社会的心理,就会立即变成社会反抗的行动。毫无疑问,外国移民的社会反抗,正在日益威胁着欧洲国家的国家安全,这在法国的北非穆斯林移民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法国一国的状况,来“窥一斑而知全豹”,以洞察整个欧洲的外国移民的社会反抗对欧洲国家的国家安全的威胁状况。

如果仔细考察在法国的第一代北非的穆斯林移民,我们就会发现,尽管他们身在法国,但在文化类别上依然属于伊斯兰文化,在民族情感上依然属于北非国家,甚至在内心世界里依然向往着自己的祖国。

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当他们遭受到法国的种族歧视、社会的不公正待遇时，总是通过追随法国共产党和参加工人运动这种当时传统和正规的斗争方式，来实现自身的同化和表达对法国主流社会的不满。但与第一代穆斯林移民不同的是，第二代、第三代穆斯林移民从小就生活在法国，同时感受着法兰西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洗礼，这就使得他们不再有原祖国的概念，毕竟他们都是拥有法国国籍的法国公民。然而，由于社会、文化教育、宗教等多种原因，在法国，他们似乎又是游离于法国主流社会的二等公民，处处遭受到贫困、种族歧视、失业等社会不公正待遇的困扰。而在 20 世纪 90 年代冷战结束以后，伴随着苏联的解体，法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工人运动的影响，也逐渐消歇。穆斯林移民，特别是青年穆斯林移民就此失去了借以表达对社会不满的合法方式。于是，年轻的穆斯林移民大多通过焚烧汽车的方式，创造新闻效应，以此吸引社会大众和法国政府对他们的关注，从而要求共和国给予他们与其他法国人一样的社会地位和平等的待遇。从 1992 年以来，法国的一些城市几乎每天都有为数不少的汽车被焚烧，这正是法国的北非穆斯林移民表达对法国社会不满的方式。1995 年，法国的巴黎郊区、里昂、图卢斯、斯特拉斯堡等城市连续发生反抗社会的暴力事件。在里昂，仅仅在 1995 年 10 月份，就有 200 多辆汽车被焚烧；素以平静、繁荣而著称的斯特拉斯堡，在 1995 年也有 450 辆汽车被焚烧。即使在法国国庆节期间，这类外国穆斯林移民反抗法国主流社会、反抗政府的汽车焚烧行为也屡有发生。2001 年 7 月 14 日，是法国的国庆日，一方面是欢庆的香榭丽舍大街上的阅兵式，战车辚辚，马达轰鸣，人们手举法国国旗，脸上充满喜悦，庆祝共和国的生日；另一方面，由于北非移民不满政府而点燃的 130 多辆汽车，浓烟滚滚、遮天蔽日。毫无疑问，这是统一的法国社会日益遭遇尴尬的典型表现。

2005 年 10 月，发生在法国的“巴黎骚乱”，充分显示出在法国的外国移民，特别是穆斯林移民对法国主流社会的反抗和对法国国家安全的威胁。2005 年 10 ~ 11 月，仅仅由于两个北非穆斯林移民青年意外触电身亡的小事故，便爆发了北非穆斯林移民广泛参与的“巴黎骚乱”。骚乱主体是失业青年——第二、三代北非、阿拉伯移民；骚乱区域集中在巴黎等大城市周边的“边缘化”城镇；骚乱行为具体表现为烧、砸、抢，由于这场骚乱没有特定目标，没有行动纲领，以至伤及无辜民众。随后，这场骚乱蔓延到法国的其他城市，演变成了一场席卷全国的更大规模的骚乱。在持续长达 2 个月的骚乱中，共有 4700 人被捕，650 人入狱，约有 10000 辆汽车被焚毁。毫无疑问，这种持续的、大规模的外国移民的社会反抗，使法国的国家安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与挑战。

外国移民，特别是穆斯林移民的社会反抗，既威胁着法国的国家安全，也威胁着欧洲其他国家的国家安全。因为这种大规模的社会骚乱并不仅仅限于法国，其他的欧洲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也面临着同样的外国移民的社会反抗问题。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英国种族关系监督组织主席菲利普斯在 2005 年 11 月 6 日明确指出，法国骚乱对欧洲发出了一个警告——种族融合需要通过政治努力来完成。菲利普斯在英国《观察家报》上发表文章认为，种族融合“是一项复杂的政治工作……眼前，我们的政治工作不是忙着应付种族斗争，就是在庆幸我们拥有我们假想的种族多元化”。<sup>[3]</sup>曾担任过欧盟委员会主席的意大利反对派领袖普罗迪也表示，意大利的种族融合状况也不容乐观，爆发类似法国的城市骚乱在意大利也“只是时间问题”。他担心，法国骚乱最终可能会扩散到整个欧洲大陆。果然，进入 11 月以后，以焚烧汽车为主要形式的外国移民反抗欧洲国家主流社会的骚乱越过了法国的边境，在比利时、德国和意大利等其他欧盟成员国发生了。所以，由外国移

民,特别是穆斯林移民点燃的、笼罩在西欧国家主要城市上空的浓浓黑烟,再次向人们显示了移民的社会反抗威胁着欧洲国家安全问题的严重性。西班牙的自由派报纸《先锋报》因此表示:“现在,没有人会感到庆幸,法国的秋季风暴可能是欧洲冬季风暴的前奏。”<sup>[43]</sup>尽管后来的实际情况是,其他欧洲国家并没有发生像法国那样的遍及整个国家的移民骚乱,但外国移民反抗欧洲国家的主流社会、从而威胁到欧洲国家安全的问题,已经成为欧洲各国政府和政治精英们高度关注的,并被认为是亟待解决的严峻社会问题和国家安全问题。

正因为如此,有人形象地比喻说,不仅法国,而且其他欧洲国家也与法国一样,正处于包括外国穆斯林移民在内的社会下层民众即将反抗主流社会的火山口上。显然,欧洲国家的非传统国家安全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欧洲的民族国家正陷入社会分裂的危险之中。

### 三、由移民问题所诱发的排外主义、种族主义思潮与暴行,威胁着欧洲国家的社会安全

外国移民的社会犯罪和反抗欧洲国家主流社会的行为,加剧了欧洲国家普通国民心理的不安全感。人们越来越担心,大量的外国移民,特别是穆斯林移民的到来和存在,会破坏社会的秩序,损害人身的安全,影响民族的和谐。由此,诱发了欧洲国家国民内心深处早就存在的种族主义思潮的泛滥和排外主义的暴行,从而危及到了欧洲国家的社会安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由于德国纳粹种族主义臭名昭著,欧洲各国政府对种族主义思潮和暴力排外主义的社会行为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并从立法和社会舆论等方面,限制和打击种族主义思潮和暴力排外行为。因此,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欧洲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的国民对外国移民的存在与发展给予了充分的

肯定,在一定的时期,对外国移民的到来甚至持欢迎的态度。但到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后,由于外国移民的社会犯罪和社会反抗的加剧,在欧洲国家普通国民内心深处的种族主义思潮开始泛滥,种族主义的排外暴行时有发生。法国和德国的情况清晰地验证了这一点。

在法国,20世纪50~60年代是法国战后经济重建和经济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此时,也是法国经济重建急需大量外国劳动力的历史时期。因此,为招募更多的外国劳动力进入法国,法国政府成立了“国家移民局”(OND),专门负责外国劳工的招聘和协调事宜,同时还成立了“难民和无国籍人士庇护局”(OFPRA),负责各类难民的申请和批准事宜。法国首先与中北欧有关国家,随后又与马格里布等国家签署了一系列招聘外国劳工的协议。由于“劳动力市场求大于供,再加上多渠道的有效运作,法国的外国移民人数不断上升。法国移民局的资料显示,1946至1955年间,法国年均输入移民3.3万人,1956至1960年间,上升至年均近16万人,1961至1965年间,再猛增至年均近30万人。1970年的年度统计资料显示,是年共有200万外籍工人及69万家属居住在法国”。<sup>[44]</sup>同时,法国还通过使外国劳工加入法国国籍的方式,减少了统计中的外国人的数量。正如德国Osnabrueck大学移民与跨文化研究所(MIS)著名的移民问题研究专家Bade教授所说:“在法国1955~1965年,在官方登记的外国人(阿尔及利亚人不在统计范围内),从160万上升到了230万,在这段时间里还有30.5万人,通过加入国籍而从外国人的统计中消失。”<sup>[45](P343)</sup>尽管如此,外国移民在法国的存在还是受到了法国朝野和普通国民的欢迎。1951年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50%的法国人认为外国劳工在法国从事的是有效服务,到了1973年,同一比例增长到80%,绝大多数法国人认为外国人承担了法国人不愿做的工作,值得欢迎。法国的“共和模式”也得到了

外来移民的普遍赞同。1966年至1967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五位研究者对外国劳工在西欧主要国家的生活状况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其中之一是外国移民对接纳国满意度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法国的得分在8个被调查国中名列榜首，而且，在调查表罗列的12个项目中，法国在对外国移民的职业培训、语言教育、社会服务、住房福利、开放入籍等9个项目上均获得最高分。<sup>[4]</sup>

然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包括难民和非法移民在内的大量外国移民的到来，外国移民的社会犯罪率持续上升，再加之外国移民及其后裔对法国主流社会的反抗，使法国基本的社会安全受到威胁，并在法国普通民众的社会心理上产生了强烈的不安全感。1985年的一项社会民意测验显示，在接受调查的法国民众中，有45%的被调查者担心个人的安全问题。这一问题在妇女中的比例是55%、在小商贩中是60%、50岁以上的人中为53%。<sup>[6] (P187-189)</sup>人们突然感觉到，即使在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家里，不仅有可能遭受到外国移民的袭击，而且也有可能遭受到同样是法国国民——非洲移民后裔的同胞的袭击和伤害。这时候，法国国民对自身安全的担忧，就会导致他们对外国移民产生强烈拒斥的社会心理。20世纪80年代的多次民意社会调查显示，有46%的受调查者认为，法国政府对外国移民，特别是穆斯林移民作了太多的让步。另有70%的人主张，为了自身的安全，应将外国移民，首先是穆斯林移民全部驱逐出境。伴随着外国移民，特别是穆斯林移民的增加，这种拒斥穆斯林移民的社会心理日趋严重。20世纪90年代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有76%的法国人认为，在法国的阿拉伯移民太多了。<sup>[7]</sup>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排外主义、种族主义思潮的沉渣，在高举反移民大旗、主张“法国人优先”的种族主义的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的鼓噪下，在法国部分民众的内心深处泛起，并最终

在法国的一些城市形成了针对穆斯林移民的暴力行为。据法国警方统计，1991年全国爆发的以排外和种族主义为目的的暴力事件有1235起，1992年达到了2285起，增加了85%。正如法国史学家Andre Armengaud所说：“马格里布人、土耳其人和非洲人一直是部分法国种族主义者的牺牲品。”<sup>[8] (P97-106)</sup>而且“这种种族主义和排外情绪由来已久。有些人喋喋不休地谈论19世纪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的反犹太主义，却忘记了这个世纪之末在法国南方的马赛、埃格蒙特等地外国移民所遭受到的种族主义者的疯狂袭击。”<sup>[8]</sup>这位法国史学家的评论是极其中肯的。日益增多的种族主义的排外暴行和鼓噪新种族主义的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的领导人勒庞，在2002年总统大选的第一轮中胜出，从而向传统右翼政党的总统候选人希拉克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等社会事实表明，法国的社会安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

在德国，由于政府对种族主义思潮始终给予高度的警惕和戒备，因此，种族主义思潮和针对外国移民的暴力行为，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表现得并不明显。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着德国的统一、冷战的结束和德国实行的国籍法中的血统原则，中东欧国家中拥有德国血统的外国移民蜂拥而来，进入德国的人数，每年达到40万人。显然，这些拥有德国血统的外国移民面临着要承担社会融合的艰巨任务。另外，尽管德国实现了统一，但东部德国人也同样面临着要承担社会融合和一体化的任务。对于德国东部人来说，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在急剧的社会、经济、政治和精神文化的极大转折和社会变革中，他们大多都生活在一种“西方进口”的、没有实现社会融合的陌生社会环境中。正如Klaus J. Bade教授所说：“不是人进入了陌生的地方，而是彷徨的人的社会心理，进入了陌生的境地。半个世纪形成的人们习惯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心理，难以在短时

间里适应新德国的社会,许多人在自己的国家里面对着二者择其一的尴尬境地:要么无条件的适应这种陌生的社会情形,要么是拒绝这种陌生的社会,而在继续加重的社会疏远环境中,以自己所习惯的方式继续生存,最终被主流社会边缘化。<sup>[51](374)</sup>

与这种社会疏远进程相联系,德国东部人在举世瞩目、充满喜悦的国家统一的进程中,对于远来的日益增加的外国移民和难民(1992年在德国提出避难申请的外国移民达到了43.8万人,占当年整个欧洲避难申请总数的 $2/3$ <sup>[91]</sup>)缺少社会融合的足够准备。德国统一以后,从境外而来的外国移民,例如政治避难申请者,依据统一条约被分配到新的联邦国家的不同的州中——东部德国的各州。对于东部各州的德国人而言,大多数人在面对政治转型、经济倒退、与西部德国人的社会地位及物质生活上的巨大差距等原因而产生的自我社会疏远感,大大增加了他们对外国人的敌对态度,因此,新种族主义的暴力排外事件在东部德国屡有发生。处于国家统一喜悦中的人们发现,新种族主义的暴力行为,在德国西部一开始很少被人们注意到,因为在大众媒体上还没有发现此类对外国移民攻击的暴力事件。而在德国东部,针对外国人的日益增加的敌对性,使人们误认为,好攻击是德国东部人的特点,但实际上这是由于社会生存环境的恶化而威胁着的社会边缘性群体的一种过激的自卫性反应。伴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在德国东部地区外国移民,特别是穆斯林移民和难民的增加,东部德国针对外国人的种族主义暴力行为日益加剧,随后,新种族主义的暴行,便扩展到整个统一的德国境内。1991年9月17日到22日,在东部Hoyerswerda那里,政治避难申请者从他们的住所中被新种族主义分子驱赶出来,在运送他们的公共汽车上遭到石块的攻击,而且被击伤。在Rostock-Lichtenhagen,1992年8月23日至27日,政治避难申请者在公众的注视和公开鼓动下,在他们已被焚烧的住处被种

族主义分子围攻。1991年10月3日,在西部的“Huenxe”,两个难民的孩子被种族主义分子用火烧成重伤。1992年11月23日在“Moelin”和1993年5月29日在“Solingen”,很久以来就在德国居住,并在那里出生和成长的土耳其穆斯林移民家庭的成员,在他们的房子里被烧死或受重伤。1994年3月25日晚上,在Luebeck,1938年民族大屠杀以后的德国历史上,再次点燃了犹太人教会的教堂。据德国内务部统计,1992年德国共发生2544起仇外暴力事件,1993年又发生1609起,2000年发生了德国统一后历史上创纪录的15951起排外暴力犯罪案件。<sup>[10](P248-249)</sup>毫无疑问,德国针对外国移民的新种族主义思潮和排外主义的暴力行为,严重威胁着德国的社会安全。

在其他欧洲国家,民众对外国移民不信任的敌视情绪和针对外国移民的暴力行为也是有增无减。Tommas Lundin认为,“在被称为移民政策成功典范的瑞典,排外和极右翼主义也在迅速蔓延,焚烧难民营,欺负外国人,散布种族主义,新纳粹动用暴力的顽固核心向所有‘非雅利安人’宣战。评论家们把事态的发展归咎于一度被人盛赞、而现在却失败的瑞典移民政策,归咎于经济态势。”<sup>[11]</sup>但无论是什么原因,在欧洲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有增无减的对外国移民的敌视情绪和暴力排外行为,严重影响了欧洲国家的社会安全,这已成为了一个不争的社会事实。

#### 四、小 结

通过以上的叙述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外国移民的社会犯罪和对主流社会的反抗,以及它们对欧洲国家的民族安全和国家安全所形成的威胁和挑战表明,在欧洲国家内部越来越多地被分化为种族、宗教、文化、习俗各不相同、而且有时甚至是相互对立的族群。什么是族群?这一看来似乎是简单的问题,在国际学术界却

历来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正如著名的思想家依曼努尔·沃勒斯坦所指出的那样，“什么是族群？答案似乎是最简单不过。每一个族群有自己的名称、这些名称耳熟能详，各自似乎都有悠久的历史。但任何一个民意调查员都知道，即使调查对象同属一个族群，对于这样一个无确定答案的问题：‘你是什么人？’回应也会五花八门。如果问题不是当时的政治焦点，回应情况更会如此。”<sup>[12] (P71)</sup> 尽管我们不能在严格的科学意义上，为族群下一个完整的、为学术界所广泛接受的定义，但我们依然能够深切地感受到族群的存在及其在当代欧洲社会的重要意义。因为在当代的欧洲国家，一方面，欧洲一体化的巨大进步，推动着欧洲不同国家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族群的外国移民越来越走向一体化；另一方面，种族、宗教、文化、习俗各不相同的不同族群的存在，以及不同族群之间的冲突，也伴随着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的加深而得以强化，这正是造成欧洲国家外国移民的社会犯罪与对主流社会反抗的根本原因。越来越多的外国移民的社会犯罪和对主流社会的反抗表明：欧洲国家已分化为不同的族群，而族群在当代欧洲国家的非传统国家安全中的意义，也显得越来越重要。恰如沃勒斯坦所说：“族群身份是历史资本主义由来已久的一个主要建构、主要支柱。资本主义越往纵深发展就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我们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地依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世界历史社会中形成的这些基本群体。”<sup>[12] (P85)</sup>

第二，外国移民的社会犯罪和社会反抗所导致的对欧洲非传统国家安全的威胁，不仅激起了种族主义思潮的泛滥，而且也推动了欧洲极右翼政党的崛起。欧洲的福利、稳定与发展，吸引了大量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移民移居欧洲。但由于外国移民的社会犯罪和社会反抗所导致的在西欧国家的民众中广泛存在着的敌视外国人的种族主义情绪，也伴随着外国移民的增多而日益增长。1992年6月法国政府的社会

调查表明，70%的法国公民认为法国国内的阿拉伯人太多，45%的人认为黑人太多，94%的人认为法国国内到处都有种族问题。在同月进行的英国民意测验中，79%的黑人、67%的白人和56%的亚洲移民，都认为英国的种族主义问题很严重。<sup>[13]</sup> 这种种族主义的排外情绪，为西欧那些主张保障极端民族利益、反对外来移民的欧洲极右翼政党的崛起，提供了深厚的政治选民基础。于是，欧洲极右翼政党，如法国的国民阵线、奥地利的自由党、意大利的全国联盟、瑞士的人民党等，抓住了这部分选民的心理，将所有的民族安全、国家安全和国家安全问题完全归结为外国移民的存在，进而高举反移民的大旗，宣扬极端的民族主义，并参与各国的议会选举甚至是总统大选。欧洲极右翼政党的这种竞选策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2000年以来，奥地利自由党、意大利全国联盟、法国的国民阵线、荷兰的名单党、瑞士的人民党相继获得了欧洲国家中下层选民较高的社会支持率，而进入议会或政府，从而在欧洲的政坛上异军突起，成为欧洲政坛上的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政治力量。<sup>[14]</sup>

第三，为维护欧洲国家的非传统国家安全，欧洲国家不同种族、不同族群的社会融合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但社会融合的任务依然任重而道远。对欧洲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而言，外国移民的社会融合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欧盟成员国公民之间的社会融合。由于欧洲一体化的成功发展，欧盟成员国之间移民的相互迁移，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特别是申根机制的资本、技术、人员和货物的自由流动机制被引入欧盟以后，欧盟成员国公民在其居住的非祖国的申根国家的社会融合问题，由于社会发展水平、文化、宗教、生活习俗等方面的接近或相似，一般说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同化，自然就得到了解决。二是非欧盟成员国的外国移民与欧盟成员国公民的社会融合。这也是欧洲国家所面临的最大的非传统国家安全



问题之一。一方面,正是这部分外国移民,特别是欧洲最大的外来移民族群——穆斯林移民群体,由于其深受伊斯兰宗教文化的影响,而且伊斯兰教又没有实现与世俗社会的分离,因此,伊斯兰教教义依然紧紧地控制着欧洲的穆斯林移民,毫无疑问,这严重阻碍了欧洲的穆斯林移民融入欧洲国家主流社会的步伐。另一方面,欧洲国家缺乏统一、持续的社会融合政策。欧洲国家的民主选举机制,决定了欧洲国家的政府经常是左翼政府和右翼政府轮流执政。一般说来,左翼政府给予了外国移民以更多的宽容,主张实施更积极的移民政策和社会融合政策;而右翼政府则主张严厉地限制外国移民,在社会政策上,拒绝或者排斥外国移民的进入和融合。这就造成了欧洲国家政府在对待外国移民社会融合政策上的左右摇摆,从而直接影响了外国移

民融入欧洲国家主流社会的进程。但毋庸置疑的是,没有与欧洲国家的主流社会实现良好融合的外国移民群体,特别是最大的穆斯林移民群体所造成的移民社会问题,已经对欧洲国家的非传统安全构成了严峻的威胁和挑战。在这种背景下,维护欧洲国家的非传统安全,就必须尽快实现外国移民群体与欧洲国家的主流社会的完全融合。但显而易见的是,外国移民群体,特别是穆斯林移民族群,始终没有改变其消极地融入欧洲的愿望,伊斯兰教依然深深地控制着穆斯林移民的世俗生活。所以,在欧洲国家政府没有更好地实施社会融合举措的情况下,要实现外国移民族群与欧洲国家主流社会的融合,保证欧洲国家的非传统国家安全的宏伟目标得以实现,依然是任重而道远。

#### 参考文献:

- [1] EU's Committee. The EU member States and Immigration in 1993/1995. Brussel, 1996.
- [2] 宋全成. 欧洲移民问题与欧洲一体化 [J]. 北京大学学报, 2002, (1).
- [3] 法国骚乱对欧洲是警告, 最终可能扩散到整个欧洲 [EB/OL]. <http://www.news.163.com/08/11/2005>.
- [4] 李明欢, 卡琳娜·盖哈西莫夫. 共和模式的困境 [J]. 欧洲研究, 2003, (4).
- [5] Klaus J. Bade. Europa in Bewegung, Migration vom spaeten 18. Jahrhundert bis zur Gegenwart. Muenchen: Verlage, C. H. Beck, 2002.
- [6] H. M. 布宁. 社会党和法国 80 年代的社会政治斗争 [M]. 俄文版. 莫斯科, 1989.
- [7] 金重远. 法国极右翼政治势力的历史和现实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2003, (5).
- [8] 王家宝. 法国移民问题浅析 [J]. 史学理论, 1996, (3).
- [9] <http://www.Bundesamt fuer Migration und Fluechtlinge> de/Statistik-A-syl/Die Entwicklung der Asylantragszahlen seit 1985, html [EB/OL].
- [10] 姚宝, 过文英. 当代德国社会与文化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 [11] Klaus J. Bade. Drehscheibe Deutschland: Wanderungen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M]. Deutschland, Frankfurt: Frankfurter Societaets-Druckrei GmbH, 2000.
- [12]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Construction of Peoplehood: Raceism, Nationalism, Ethnicity [A]. Etienne Balibar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Race, Nation, Class—Ambiguous Identities [M]. trans by Chris Tumer. London and New York.
- [13] 张善余. 九十年代以来国际人口迁移的新浪潮 [J]. 人口与经济, 1993, (3).
- [14] 宋全成. 欧洲移民问题的形成与欧洲极右翼政党的崛起 [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 (1).

责任编辑 宋雨桃

language. In order to find its solution, Russell brings up atomism, Wittgenstein puts forward the picture theory and Quine proposes the theory of observation sentence. At the level of the dualism of rationalism, they all try to build a bridge between fact and language. However, in the perspective of phenomenology and super-dualism, language, fact and mind are connected, that is, there is a transcendental passage between them. As for this issue, Wittgenstein and some phenomenologists have seen their internal connection, and Quine has seen their external connection. Because McDowell has seen only their internal connection and ignored their external connection, he wants to abandon such philosophical issues. The paper aims to expound the theory of the original sentence from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perspectives and to prove it to be the connecting point of among language, fact and mind.

### **Metaphor : the Charm of Poetic Philosophy Revealed in the Similarity between Zhuang Zi 's Philosophy and Western Postmodern Philosophy**

GUO Jimin

"The return of poetic philosophy" is one important feature of Western postmodern philosophy, and one fundamental cause for this philosophical turn originates from the special metaphor in poetic language. The features of Zhuang Zi 's philosophy also find expression in its metaphor. Thus, the similarity between Zhuang Zi 's philosophy and "the poetic return" of Western postmodern philosophy finds expression in the relation between philosophy and metaphor, the intersection of metaphor and truth as well as the ways of thinking about metaphor. Thus, it is safe to say that "the return of poetic philosophy" embodies a kind of real humanism.

### **Liberty and Its Variants : Hayek 's Contribution to Freedom**

LIXiao-ke

Freedom is a core concept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but there ar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it. Hayek distinguishes liberty from its variants or the distorted ones, such as political freedom, metaphysical freedom, and the conditions of freedom (power, wealth), and the uses of freedom. His reduction of freedom to its oldest and original meaning, a person 's state of being independent of the arbitrary will of another, can be compared in some degree to Heidegger 's reduction of *das Seiende* to *Sein*. Hayek 's interpretation of liberty and his understanding of its nature have grea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to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freedom.

### **On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the Social Problems of the Immigrants on the Non-traditional National Security in Europe : A Study in the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SONG Quan-cheng

The European countries in the later 20th century, especially the countries of Western Europe, experienced a dramatic change from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national security to the non-traditional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1970s and especially after the 1990s, the social problems caused by numerous immigrants posed serious challenges to their non-traditional national security. These challenges found expression in the following: these social problems posed a threat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of the European countries; their social rebellion posed a threat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of the European countries; the immigrant-induced exclusivism, nationalism and wrongdoings posed a threat to the social security of the European countries. Thus,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ir national security, the fusion of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and races in these countries has become a serious and urgent issue but its solution is no easy task.